

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

李艳枝

法图拉·葛兰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本文通过对其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概括了葛兰伊斯兰思想的基本内涵。葛兰强调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是信仰的内化和精神与实践的兼修；葛兰指出土耳其引入的西方式现代化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现代化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葛兰坚信宽容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多元主义是土耳其社会的固有特征，宗教对话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葛兰认为土耳其应该通过共同的族源和宗教纽带强化与中亚诸国的认同，通过与西方的结盟促进土耳其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通过排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极端倾向为伊斯兰运动赢得新的空间。葛兰的伊斯兰思想是基于现实需要对伊斯兰教的时代解读，体现了当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全新发展思路。

关键词：法图拉·葛兰 土耳其 苏非主义 现代化 宗教对话

作者：李艳枝，1977年生，历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奉为圭臬，通过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但现代化过程中精英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断裂使得凯末尔的现代化改革只是在政权的核心区域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农村和边缘区域伊斯兰传统仍然根深蒂固，所以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首先在边缘地区发轫，然后迅速向国家的中心区域扩展。由于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诉求不同，土耳其伊斯兰力量也表现不同，既有传统的苏非教团的复苏，又有伊斯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角逐政权的行为，还出现了积极探索伊斯兰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整合的伊斯兰思想家，其中以法图拉·葛兰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法图拉·葛兰 (Fethullah Gulen) 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思想家、活动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诸多媒体称其为当今土耳其非官方宗教领导人，¹ 其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颇负盛名。葛兰于1938年出生在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省的一个小村庄。1958年，从初等神学学校毕业后，获得教职资格，成为政府任命的宗教官员。1966年，移居伊兹米尔，开始在土耳其游历、

¹ Bulent Aras, "Turkish Islam's Moderate Face," *Middle East Quarterly*, September 1998, 27.

演讲，传播伊斯兰原则和努尔西思想¹，他得到新发展起来的安那托里亚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其周围迅速集结大批追随者。20世纪70年代初，在左右翼政党激烈斗争的条件下，葛兰认识到应与各种政治组织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开始通过教育活动来扩大其影响。1980年第三次军人政变后，国家公诉人针对葛兰的宗教立场对其提起诉讼，但由于军政府试图借助伊斯兰教来消弥左右翼之间的冲突，提出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所以并没有判处葛兰，随后葛兰继续在伊兹米尔和伊斯坦布尔专事写作和教化育人。在厄扎尔政府时期，葛兰思想逐渐趋于成熟，社会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于是葛兰与当局之间呈现互相借重的发展趋势。1995年，葛兰因“阴谋反世俗主义和企图建立神权国家”的罪名遭受指控，葛兰与当局的关系趋于紧张；1997年军方发动迫使繁荣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垮台的软政变之后，再次以“企图改变土耳其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创立秘密组织”的罪名将葛兰逮捕，但7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而将其释放，他继续在各城市之间旅行，传播其思想。^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恶化的身体状况使得葛兰于1998年移居美国。1999年3月迁到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葛兰被视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中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在普通穆斯林中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生活俭约、坚守独身，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当前主要通过其所构建的网络机构传播思想，并对世界范围内的葛兰运动发挥着遥控的指导作用。

葛兰学贯东西，通晓古今，研究主题包罗万象，他的布道与演说被制成数以千计的录音带和录像带，他的文章、讲演及问题回答则被编纂成书^④，其伊斯兰思想通过这些载体得以明确的阐释，其中苏非主义、土耳其现代化模式、宗教对话和民族国家安全等思想是重点阐述的对象，因而本文也主要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国外关于葛兰思想的研究较多，但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缺乏对于葛兰思想的全面把握；国内则很少有学者谈及这位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这与当前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现状很不相符，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图拉·葛兰的宗教思想的解析来分析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概貌，以期对解读当前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发展趋势有所借鉴。

一、自我方式的苏非主义

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帝国发展过程中与正统伊斯兰教相对应的民间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代表了下层民众的社会意愿，一般主张通过神秘主义的体验来实现人主合一，在帝国的漫长历史中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严格控制伊斯兰教，凯末尔主义者取缔了

¹ 赛义德·努尔西（1873-1960）是现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曾穷尽毕生精力注解古兰经，后以《光的书信》的名称结集出版，其追随者形成土耳其颇具影响的努尔库运动。努尔西一生经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一党制时期、土耳其多党制三个时期，其思想意识随着历史变迁而改变。有学者认为葛兰属于努尔库成员，但葛兰本人认为其仅仅接收了努尔西部分思想。努尔西更多强调的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影响民众，而葛兰则强调通过教育和文化层面的实践来影响民众的抉择，但二者在宗教宽容、宗教对话、民主观和科学观等思想方面具有历史传承性。

^④ Arthur Bonner, “An Islamic Reformation in Turke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 No. 1, Spring 2004, p. 92.

^④ 这些书具体如下：《时代带来的犹疑》（四卷）、《有关信仰的问题与解答》、《心中的翡翠山坡》、《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时代与这一代的年轻人》、《准则或路上的明灯》（四卷）、《智慧之珠》、《时间的黄金面》、《色带上的真理之芽》、《破碎的琴拨》、《有关〈古兰经〉首章的思考》、《永恒之光》（三卷）、《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面貌》、《面对失落的天堂》、《信仰的恩荫》。这些著作都用土耳其语撰写，部分被翻译成英语，目前只有《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面貌》被翻译成中文，由台湾希泉出版社出版。

苏非教团的合法地位，但作为与传统紧密结合的历史载体，苏非教团仍然在非法的状态下继续生存和发展，其中一些苏非教团在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纳格什班迪教团和苏来曼尼教团等。葛兰的苏非主义思想来源于以下三点：一是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二是纳格什班底教团的传统，三是努尔库运动，葛兰主要关注的是现世的利益而非精神的需求，所以许多学者称葛兰为新苏非主义者，“寻求自我方式的苏非”。¹

葛兰把古兰经和圣训作为精神发展的指导方向。他认为古兰经不仅是基本的指导原则，而且是所有苏非思想和实践的来源，因而真正的苏非主义者是将古兰经和圣训信条内化为自己精神并重塑自己行为的人。葛兰所强调的苏非主义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葛兰认为苏非主义是精神与实践的兼修，而非纯粹的思辨，“苏非主义意为远离罪恶和人性中的弱点，获得天使般的特性以取悦于真主，根据知识和爱真主的需要而生存，以获得随之而来的精神愉悦。”^④由此可见，葛兰所强调的苏非主义意为克服通向真主之路的障碍而获得真主赋予的美德和行为，这种理解与几个世纪以来苏非学说的主流相一致。其次，葛兰认为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自然强调精神世界的需求，它将训练自我作为基本原则，以达到禁欲、虔诚、仁慈或真诚，所以只有那些寻求伊斯兰内在价值以控制自我冲动的穆斯林是真正的苏非主义者。最后，葛兰认为苏非主义还是一种克服自我意识，冷静面对生活挫折和坚强面对失望与痛苦的生活态度。苏非主义能使穆斯林获得真正的道德价值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主的意愿，苏非主义使人理解实践宗教虔诚不是一种负担，而是通向幸福、快乐之路的重要途径。所以说，葛兰所强调的苏非主义只是信仰的内化而非前苏非圣人所强调的神秘主义体验。

以此为基础，葛兰认为当前许多苏非离群索居，沉溺于形而上的冥思，是造成土耳其教育危机的根源，因而需要形成一种科学知识 with 精神道德的融合的新型教育方式。“当前，世俗学校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苏非主义教育沉溺于形而上学的冥思，军队仅仅关注于武力素质的培养，因而实现科学素养与精神价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④他指出，世俗的教育体系不能使自己抛却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定式思维，而宗教教育不能满足科学和技术的挑战，他们缺乏打破过去的灵活性与视野，也不能根据变化的形势给学生提供必要的教育模式。苏非教团尽管着眼于培养穆斯林的精神道德，却不能很好面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在葛兰看来，这是“用几个世纪以前的圣人的道德和价值来自我安慰。”^{1/4}所以说葛兰建立了广泛的教育体系以实践其奠基于科学与道德融合的教育理念。

由于对苏非教团的否定性态度，葛兰并不认为他领导的葛兰运动为苏非教团，也否认自己是传统意义的苏非导师。这或许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因为在当今的土耳其，尽管在民主化进程中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给予苏非教团较大的活动空间，但就法律意义而言，苏非教团仍处于非法地位，且被坚定的世俗主义者视为土耳其社会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障碍。葛兰坚称他并没有创建一个新的苏非教团，他本人也不属于任何苏非教团，“宗教教团作为一种体制出现在先知去世后的六个世纪，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机构。我没有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1/2}

其实对于许多早期的苏非主义者而言，苏非主义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苏非之路是达到与真主合一的途径，是寻求永恒真理的道路，所以近代的苏非主义者称其领导或参加的教团为

¹ Zeki Saritoprak, Fethullah Gulen: A Sufi in His Own Way, in M. Hakan Yavuz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ulen Movement*,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6.

^④ S. J. Thomas Michel, "Suf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Fethullah Gulen",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5, July 2005, p. 347.

^{④1/4} Fethullah Gu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Truostar, 1996, p. 11.

^{1/2} S. J. Thomas Michel, "Suf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Fethullah Gulen", p. 343.

Tarikat。一些苏非主义者强调神秘的体验，认为真主位于心中，只有通过一种癫狂、幻觉或梦境等异乎寻常的体验才能实现对真主的认识，而静思是达到内心中真主的朝觐之路。毫无疑问，葛兰已经突破这种传统的苏非主义模式的窠臼，并根据时代的需要对苏非主义提出全新的见解，强调的是根据伊斯兰原则解决现实问题，尽管在苏非教团制度化的今天，他并不属于任何苏非教团，但是就本质而言，一个人是否是苏非不在于冠以何种名称，而在于精神和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认为葛兰思想仍然属于苏非主义的范畴，称其为自我方式的苏非当之无愧。

二、独特的现代化模式

面对现代土耳其所面临的挑战，葛兰提出了整合传统与现代的思想。葛兰首先从对当代土耳其教育制度的批评入手，他认为土耳其的宗教学校和苏非教团的教育机构并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不能培养出为现代世界创造积极贡献的精英分子，并且他们的教育方法并不能将科学技术发展与传统的教育规则相结合，学生只能单一地掌握基于伊斯兰教的宗教知识或道德价值。在对世俗学校和军事院校批评中，指出这些学校尽管认识到现代科学和技能的重要性，但不能将伊斯兰传统中的道德和价值纳入其教育体系中，因而这些学生或许能在技术或专业领域找到工作，但他们缺乏工作的目标性和改造世界的勇气，而个人修为的缺失使他们不能有效地抵御权力、贪欲和自私心的引诱。¹ 指出这四种教育的主要缺陷是缺乏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科学与宗教、技能与性格培养的整合，这种缺失将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只有整合传统与现代，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宽容的社会。

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只是社会整体挑战的一个缩影。葛兰指出土耳其目前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对传统的背离，因而只能是表面的现代化：“如果一个社团的民众缺乏信仰、爱、热情 and 责任感，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视为是文明的。尽管其社会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改变，但文明是一种心智和精神现象，与技术、服饰、家具和奢侈品无关。当代社会流血纷争频仍、屠杀和冲突无休无止、唯利主义盛行，这表明发达国家人民并没有创建真正的文明，当然效仿者更不可能。”^④

葛兰认为坚持西方化为现代化唯一方式的人只是引入了新奇的面面化的生活方式，也忽略了真正的挑战。葛兰认为民族发展的真正目标是文明，是个人与社会的复兴，不改变人的本质行为的形式改变只是一种文化犯罪和误导。西方化学者将技术进步视为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凝聚传统文化精华的道德与价值，因而不完善的。实现真正的文明不能单纯靠模仿他人来实现，而要通过思维的变化、行为方式的改变、道德的提升和个人诚实。只考虑物质繁荣而不追求精神道德的提升是土耳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西方式现代化有助于实现生活的表面现代化，但这不等于文明。文明是指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其不能通过富裕、奢侈和舒适的生活方式来体现，应通过思想、行为和感情的净化（来实现）。文明意为个人的精神进步和自我意识的更新……文明不是仅仅盲目的模仿西方，而是根据时代和环境需要选择一条理性之路。”^{④④}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精英分子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试图通过全盘西化来实现跨进现代文明行列的目标。面对西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处于统治地位的现实，不同的土耳其人做出不同的反应：一些土耳其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统治是社会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如果穆斯林国家希望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与西方趋同。但这种无视历史的做法使穆斯

¹ S. J. Thomas Michel, “Suf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Fethullah Gulen”, p. 349.

^④ Fethullah Gu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pp. 72–73.

^{④④} ibid, p. 70.

林世界面临发展困境，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并非具有普适性，所以附着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土耳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选择。葛兰曾说：“许多年来，由于西方列强将其在近代的发展归结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便将伊斯兰教视为落后的主要原因，而抹杀了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因此他们缺乏对伊斯兰教及其漫长发展历史的研究。”¹ 另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同样认为现代化是西方化的同义语，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西方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不足和负面影响，他们反对西方社会中的世俗化倾向、道德相对性和对民众利益的破坏，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化具有破坏性，因而是伊斯兰社会发展的阻碍。葛兰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是与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和现代化的实质相抵触的。

葛兰认为原子弹爆炸、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发生、环境污染和社会道德沦丧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因而单纯强调科技而忽略道德并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现代化，所以伊斯兰的现代化方式应该是一种中间道路，既不反对科学，也不会盲目将其奉为神明，但葛兰所倡导的这种中间道路并非是在伊斯兰教和现代化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而是在伊斯兰教自身发展基础上的延伸，即介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入世和出世、现世和来生之间的一种平衡，其最根本的是寻求一种现代与传统的融合。^④ 葛兰认为如果穆斯林坚守传统与现代的调和，那么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既不会不加选择的接受，也不会盲目拒绝。而通过西方科学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启现代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采用的做法，所以说葛兰的这一想法触及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实质。

整合传统与现代并非葛兰的首创，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倡导者齐亚·盖卡普就提出有必要创建一个实现土耳其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体系，葛兰则在继承该思想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创新，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生活的基础，而伊斯兰文明则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葛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尽力复兴传统价值并将其作为土耳其现代化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在整合与协调土耳其历史与现实方面取得一定成功。然而将千百年来的传统与土耳其现代化真正接轨并非易事。

三、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是葛兰思想的核心内容，这构成其政治、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葛兰的宗教对话思想来源于古兰经所倡导的宽容和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并对此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全新的解读。

首先，葛兰主张宗教宽容，坚持信仰与民族平等。葛兰将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其宗教对话的理论基础，葛兰承认多元主义的发展倾向，相信通过劝说来传播信仰是在文明世界传播宗教的惟一有效途径。他强调爱、同情、宽容和原谅等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宣称“爱是每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光辉灿烂的射线，是能阻止和克服各种压力的伟大力量。”^④ 他还强调应像先知那样对敌人表示宽宥，“为他们的热心鼓掌，理解那些真诚的心灵，对虔诚者表示友善，接近那些不信教者以消融他们的嫉妒和仇恨，用热情来温暖他们。”^{1/4} 他还说：“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其宗教信仰，这些广泛接受的道德如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意和自由都是

¹ Fethullah Gulen,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the Essentials of Islamic Faith*, Izmir, Kaynak, 1997, p. 309.

^④ Ahmet Kuru, *Searching for a Middle Way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the Case of Fethullah Gulen*, in M. Hakan Yavuz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ulen Movement*,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7.

^④ Ali Unal and Alphonse Williams eds., *Advocate of Dialogue*, Fairfax Virginia: The Fountain, 2000, p. 253.

^{1/4} Lester R. Kurtz, "Gulen's Paradox: Combining Commitment and Tolerance",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5, July 2005, p. 376.

各宗教所极力赞许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佛陀、希伯来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启示中。”¹ 因而在葛兰看来，具有共同道德价值标准的不同宗教信仰存在信仰对话的基础。

葛兰还认为世间生灵一律平等，不能因为种族、肤色、年龄和民族等原因而遭受歧视；指出正是因为伊斯兰教接受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先知和经典，所以穆斯林才是亚伯拉罕、穆萨、大卫、耶稣及其他希伯来先知的追随者。^④ 在这种背景下，他不仅强调三大闪族起源的宗教，而且承认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平等地位。他曾引用著名的苏非诗人鲁米的名言：“每个人都像一支圆规，一端植根于信仰和伊斯兰教传统，另一端指向外部世界，达到这两点，穆斯林的理想就能实现，既深深植根于自我世界，又充满着爱……既能与真主合二为一，又能成为社会中的一员。”^④ 这种立场和态度就成为葛兰所强调的宗教对话的出发点。他又说：“土耳其人对伊斯兰的解释是开放的，它吸引了不同派别的思想后成为国教，因此我认为土耳其的穆斯林是兼收并蓄的，除了坚守古兰经和圣训，也对伊斯兰精神层面的苏非主义持接受的态度。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包括古兰经和圣训中主要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又根据土耳其历史和苏非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为什么是宽广的、深邃的、宽容的、包含一切的、以爱为核心的原因。”^¼

其次，葛兰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理念，反对恐怖主义。葛兰认为和平的非暴力思想已经包含在古兰经的信条中，“你们当敬畏真主，调停你们的纷争”（8：1）；“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停”（49：9）；葛兰还从土耳其的现实斗争中认识到非暴力思想的重要性，他亲眼目睹左右翼势力之间的斗争使成千上万人失去生命，库尔德人的分离斗争在15年内造成3万人死亡，所以他要求其追随者远离冲突，“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½ 他指出，先知本人就是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生动例子，为了实现和平，先知接受对手提出的苛刻的侯达比亚条约，放下武器进入麦加。^¾ 即使面临着身陷囹圄的危险，葛兰仍然坚信“真正的穆斯林是安全可信的，是不必表示怀疑的，因为他们不会用流言蜚语伤害他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他们反复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爱和怜悯来感化他，始终如一的用爱来对待他人。”^⑧ 和平的立场也引发葛兰对恐怖主义的谴责。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葛兰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没有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⑨ 针对一些人利用恐怖主义谋取政治目的的做法，葛兰说：“伊斯兰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不会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目标，恐怖主义者不可

¹ Http://www.Fethullahgulen.org/articles/interfaith.html (September 1, 2003).

^④ Ihsan Yilmaz, “Ijtihad and Tajdid by Conduct— The Gulen Movement”, in M. Hakan Yavuz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ulen Movement*, p. 230.

^④ Ali Unal and Alphonse Williams eds., *A dvocate of Dialogue*, p. 207.

^¼ Ihsan Yilmaz, “State, Law, Civil Society and Isla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5, July 2005. p. 395.

^½ Zeki Saritoprak, “An Islamic Approach to Peace and Nonviolence: A Turkish Experience”,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5, July 2005, p. 423.

^¾ ibid, p. 413.

^⑧ ibid, p. 424.

^⑨ Lester R. Kurtz, “Gulen’s Paradox: Combining Commitment and Tolerance”,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5, July 2005, p. 378.

能是穆斯林，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从事恐怖行为的”¹ 但他并不排斥正义的武力，“用剑之战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只有在防御时才能实施。”^④ 在其著作中，葛兰给予更为全面的解释：“吉哈德就字面而言是指尽力实行某种目标，和战争并非同义语，指的是为真主事业而战的任何努力。”^④ 葛兰对非暴力的呼吁，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充分证明其是和平的爱好者和倡导者，也有力的驳斥了伊斯兰教好战、尚武的固执成见。他认为穆斯林已经抛弃了限制，开启了宗教对话的大门，因而主张尊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

最后，葛兰还积极促进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宗教对话包括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对话，而葛兰充分兼顾这两点，并做出成功的典范。他认为宗教多元主义是土耳其的传统，因为在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就为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共处提供了先例，指出自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以来就存在着多元主义的历史实践：“穆斯林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颇为宽容，没有歧视、大屠杀、违反人权和种族灭绝等现象发生。相反犹太人在处于困境时得到欢迎，当他们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时，是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他们。”^¼ 葛兰主张抛弃土耳其长期存在的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隔绝状态，实现土耳其内部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伊斯兰教内部，法律和文化的多元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必须尊重这样的现实，并且“阿拉维派也丰富了土耳其文化”，所以他鼓励阿拉维派加快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演进，以保持现代化进程中的实体存在。他还强调修建阿拉维派的礼拜和集会场所，“在我们历史上，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在许多地方是并存的”。^½ 葛兰在1995年2月倡导举行的莱麦丹月聚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非教团参加，这是宗教对话的有力例证。

葛兰本人积极开展一系列有助于宗教交流和对话的活动：设立民族宽容奖金，先后召开八次有关信仰对话的国际性研讨会^¼，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土耳其的希腊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纽约的红衣主教和以色列大拉比，^⑤ 这些行为旨在将不同种族、思想、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集中在一起，共同讨论世俗主义、宗教和国家关系等敏感问题，以达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共识，促进世界和平的实现。他曾对记者说：“在我看来，古兰经要求我们平等接受全人类。土耳其人在九个世纪之前都这样认识伊斯兰教，我们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一致，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合乎逻辑的理性而非武力来解决。”^⑥ 葛兰还与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保持友好关系，因而当葛兰面临企图建立非法组织以用神学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的指控时，土耳其天主教联合会的秘书长乔治·马若威斯彻（Georgi Marovistch）在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为葛兰辩护，驳

¹ Lester R. Kurtz, “Gülen’s Paradox: Combining Commitment and Tolerance”, p. 379.

^④ Hasan Kose Balabon, “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Fethullah Gülen’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in M. Hakan Yavuz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The Gülen Movement*, p. 178.

^{④④} Hasan Kose Balabon, “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Fethullah Gülen’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p. 178.

^{¼ ½} İhsan Yılmaz, “State, Law, Civil Society and Isla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p. 395.

^¼ 这八次具体如下：1997年6月6-7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有关文明对话的国际会议；1998年9月21-22日召开名为“700年的宽容与并存研讨会”；1999年4月15-18日在萨利乌尔法和伊斯坦布尔召开“先知亚伯拉罕：对话希望的象征”的国际研讨会；2000年5月5-7日召开第一、二次亚欧对话；2000年5月1-2日在意大利的米兰、10月13-18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有关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国际研讨会。2001年4月，举办了“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对话的希望和统一”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4月在华盛顿的霍普金斯大学举行伊斯兰与民主的兼容性的国际性研讨会。

^⑤ Mucabit Bilici, “the Fethullah Gülen Movement and Its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urkey”,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6, January 2006, p. 15.

^⑥ Arthur Bonner, “An Islamic Reformation in Turkey”, p. 97.

斥了针对葛兰试图建立非法组织以用神学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的指控。¹ 这足以证明不同信仰的宗教领导人之间的协作，也表现了葛兰所倡导的宗教对话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为了促进土耳其内外各种力量的协作，葛兰还成立土耳其记者和作家基金会，该组织以阿班特平台（Abant Platform）为口号，成功地将不同思想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通过在国外召开会议以扩大其活动范围。以葛兰冠名的教育机构在缓解地方冲突和促进地区和谐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在阿尔巴尼亚发生冲突时，冲突双方都将这些学校作为孩子的庇难所。侯赛因·古勒斯曾这样评价葛兰：“他确立了宗教对话的框架，打破了此前的禁忌，搭建了文明交流的平台，创造了文明对话和宽容的思想。”^④ 葛兰是将土耳其的两种属性——欧洲和伊斯兰属性相结合的首位伊斯兰思想家，这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的发展和伊斯兰教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民族国家安全

尽管葛兰号称远离政治，但其对土耳其的政治和外交思想有着独特的见解，影响了现代土耳其各政党内外政策的抉择。葛兰的国家安全理念以下三点为基础：一是文化认同于突厥世界；二是通过加入欧盟来认同于西方；三是排斥伊朗的输出伊斯兰革命思想。葛兰并不认为西方是土耳其和穆斯林的威胁，相反宣称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则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敌人，因而他与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立场相近，而与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立场相左。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一个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环境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大都强调伊斯兰教的普世性道德和价值，主张基于共同的宗教纽带建立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统一，土耳其的繁荣党即为该思想的奉行着，埃尔巴坎在上台伊始就改变了访问西方国家的先例而将伊斯兰国家作为首访的对象，并于 1997 年发起组织了发展中八国集团（土耳其，伊朗，埃及，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发展中八国集团的战略构想反映了埃尔巴坎和政治伊斯兰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点燃了他们担任伊斯兰世界领导人的梦想。但葛兰却采取与此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他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处境出发，强烈要求拉开与阿拉伯世界与伊朗的距离，并小心避免提及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领导权的话语，指出不应牺牲现实主义的利益而追求虚无缥缈的土耳其领导权。他将阿拉伯世界葛兰学校的缺乏归结于阿拉伯政权设置的困难，指出深深的文化、政治和历史隔阂将波斯、阿拉伯世界与土耳其隔离开来。葛兰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部分是安那托利亚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葛兰坚决支持自由市场经济，这反映了中产阶级上升过程中赖以依存的基础，该群体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获得权力的。^④ 这也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边缘群体向政治核心的过渡，只不过他们不是借助凯末尔主义的上升渠道而是通过民主化框架下代表自己诉求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形式来实现。针对埃尔巴坎所设想的“发展中八国集团”，葛兰认为该行为是冒险的和危机四伏的，因而是一种无畏的浪费。^¼ 他认为土耳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占据突厥国家中的领导权地位，因为土耳其人和中亚突厥人是同源的，实现与中亚的整合是土耳其被西方接受为重要同伴的前提，并且这种整合也优先于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的整

¹ Hasan Kose Balabon, “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 Fethullah Gulen’ 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p. 177.

④ ibid, p. 182.

④ ibid, p. 174.

¼ ibid, p. 175.

合，所以土耳其要首先证明自己有能力整合突厥势力。¹ 这是葛兰与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相区别的地方。但葛兰又并非强调纯粹的族源关系，在其所设想的伊斯兰体系中，并没有将非突厥的穆斯林如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库尔德人排斥在外，但他对国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保持缄默。所以葛兰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才能为其战略构想提供合法性的论证。

葛兰认为土耳其目前并不具备领导伊斯兰世界实力，因而应从现实需要出发加入西方阵营，以强化自己的综合实力。他深深理解西方在国家舞台上的分量而尽力避免与其冲突。葛兰主张土耳其加入欧盟，指出：“如果土耳其和欧盟能够互相接受，未来将会很有希望，但这要求富有远见的人一方面着眼于更大的世界，另一方面关注自己所处的环境。”^④ 并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充分自信：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入欧洲关税同盟和欧盟不会从我们的宗教、民族和文化中失去任何东西。我们坚信维持我们的统一的力量是强大的，并且我们坚信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为人类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那些恐惧的人应该是那些远离古兰经教诲的人。^④ 葛兰的亲西方态度对土耳其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入盟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他伊斯兰团体反欧、反美的立场，并有效的打消了加入欧盟将对土耳其民族安全和伊斯兰传统构成威胁的顾虑。他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欧洲和西方并非是土耳其伊斯兰认同的威胁，认为“虔诚的穆斯林反对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希望未来的伊斯兰教走向欧洲，并重申了这样的认识：土耳其既是一个欧洲国家，又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这样的现实，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整合进欧洲将使土耳其更容易担任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1/4}

在葛兰看来，美国控制着世界事务，因而在土美关系方面，葛兰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认为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十分必要，“如果志愿组织（葛兰运动组织）考虑在世界不同地方设立学校，其计划方案不能与美国冲突，因为美国仍旧是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1/2} 葛兰也考虑到如果美国霸权地位衰落，将会导致其他对其不利的力量的崛起，毕竟美国的霸权及其与土耳其的传统盟友关系是有利于土耳其民族利益的。葛兰也尽力发展与西方宗教组织特别是梵蒂冈的密切联系，拜访教皇保罗二世，这种会见的象征意义似乎触动了土耳其当局，官方伊斯兰教的执行机构——宗教事务局也开启了宗教对话的大门。他曾经要求助手用世界地图取代挂在办公室的奥斯曼帝国地图，因为在他看来奥斯曼地图限制了其视野，这也表现了葛兰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传统伊斯兰教和苏非主义的狭隘限制。

葛兰对伊朗的排斥和否定立场也使其宗教思想别具一格。葛兰认为宗教政治化对伊斯兰教而言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而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做法对穆斯林世界的其他政权是一种刺激，将会使得伊斯兰运动在那里变得更加困难。葛兰指出，缺乏伊朗官方的认同是伊朗国内没有葛兰学校的主要原因。葛兰之所以反对伊朗还有以下原因：一是伊朗以伊斯兰革命的名义输出宗教狂热，他们将自己对宗教的解读置于宗教的优先地位，认为如果某人不属于什叶派就不属于穆斯林。二是伊朗什叶派的所谓爱阿里只是维系统一的一个托词，实际上他们憎恶的是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这样他们将信仰建立在错误的宗教前提之下。尽管伊朗是发展中八国集团的成员，埃尔巴坎政府也尽力通过签署双边关系协定强化双边关系，但是葛兰毫不掩饰对这个邻居的厌恶，

¹ Hasan KoseBalabon, "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 Fethullah Gulen'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p. 175.

^④ Ihsan Yilmaz, "State, Law, Civil Society and Isla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p. 399.

^④ 1/4 Hasan KoseBalabon, "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 Fethullah Gulen'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p. 176.

^{1/2} ibid, p. 177.

“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是历史积怨和隔离的结果。”¹ 在他看来，伊朗是伊斯兰世界的痼疾，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逊尼派背景及立场，也证明了其宽容的有限性。

五、思想评析

葛兰的基本思想植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宽容理念、安那托里亚多元主义历史传统、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制的社会背景，是对伊斯兰教的时代解读和创新，体现了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教的时代主题特征和伊斯兰思想家对这一主题探索的深化。

首先，葛兰的基本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务实性、灵活性和现代性的特征。葛兰的伊斯兰教观不是基于抽象的说教，他提出在尊重过去学者的基础上重开伊智提哈德之门，以对伊斯兰教做出适应时代需要的解释。^④ 他的基本思想无疑体现了这一基本立场和态度。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世性宗教，但其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而伊智提哈德是这种更新的主要工具。在他看来，就人类的思想意识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我们仍处于幼年阶段，因而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其进行质疑，通过全面研究以确立伊斯兰教变动与永恒之间的平衡，并给予伊斯兰教现代意义的解读。他指出：时间和环境是解释古兰经的重要条件，古兰经像一朵玫瑰花，每天舒展一枚花瓣，直到最终的怒放。为了探知古兰经的深度和获得其深层的含义，每隔 25 年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④ 然而他也反对借着创制之名对伊智提哈德进行滥用，因为一旦如此，每个人都可能宣称自己是教法学家，但个人毕竟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所以应该成立一个伊智提哈德委员会来弥补单个人的不足与缺陷。他鼓励其追随者为基因、器官移植、音乐、艺术、世俗和现代法律的立法提供合法性基础。^¼ 这反映了其与时俱进的特征。所以说，葛兰基本思想是伊斯兰教在面对全球化挑战而做出的能动反应的结果；是在坚持古兰经和圣训宽容原则的基础上引发出的时代主题；是在调和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前提下对伊斯兰教自身改革和发展所进行的反思。这充分反映了伊斯兰教对时代命题的高度敏感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为广大穆斯林在社会转型期改变观念和廓清方向清除了障碍。葛兰的基本思想和实践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教的精神内涵，也表现了安纳托利亚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宗教多样性的传统积淀；也就是说，葛兰的宗教思想是传统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延伸，体现了现代多元社会建构的理想，表现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民众伊斯兰势力借助政治参与的宽松环境而对政治和社会追求的明确表达，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但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倾向也使得该思想在实践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其次，葛兰的宗教对话的思想开启了当代伊斯兰教全新的发展思路，将会极大影响伊斯兰教未来的发展趋向。宗教对话的思想由来已久，但 20 世纪以来民族独立的需求淹没了民众对信仰交流的渴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宗教影响下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耗竭、都市拥挤、犯罪猖獗等的折磨，与西式现代化并生的世俗化过程也对各种宗教的影响和作用提出了挑战，这就为通过信仰对话继续强化宗教功能提供可能。另外宗教对超自然的终极实在的追求也为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理论前提。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宗教对话的倡导者孔汉思曾

¹ Hasan KoseBalabon, “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 Fethullah Gulen’ 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p. 180.

^④ Ihsan Yilmaz, “Ijtihad and Tajdid by Conduct- The Gulen Movement”, p. 221.

^④ ibid, p. 222.

^¼ ibid, p. 223.

说宣称“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¹ 所以宗教对话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但长期以来世人更多的将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渲染，又夸张了基于宗教信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争取正当权益的穆斯林的正义行为被歪曲和误解，所以穆斯林的宗教对话努力被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葛兰的宗教对话思想和实践有力地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和各种有关伊斯兰教的偏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伊斯兰教内部也出现倡导信仰对话的力量，有助于重塑宗教多元主义、推动信仰之间对话和实现不同宗教信仰的和平共处。2001 年 9·11 事件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紧张和冲突升级，葛兰的宗教对话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土耳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决定其必定在未来的宗教对话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后，葛兰的基本思想致力于寻求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平衡，但坚守宗教的主体地位，走向务实开放将是其终极的选择。葛兰的宗教思想不仅仅停留在神学与哲学的思辨，而是向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渗透，并在民族国家安全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葛兰极力主张与当局发展较为友好的关系，在厄扎尔政府时期，支持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支持军方取缔伊斯兰政党——繁荣党和美德党，所以其所领导的葛兰运动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随着从伊斯兰政党衍生出来的正义与发展党走向务实和开放，宣称支持自由、民主、人权和全球化等，葛兰要求其追随者在 2002 年和 2007 年两次土耳其大选中投票支持正义与发展党，这表现了其灵活务实的态度，也说明葛兰只有走向务实开放才能为自己赢得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尽管葛兰一再申明没有政治要求，声称反对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反对加入任何政党，但他所具有的伊斯兰背景和对政治的关注也使世俗力量感觉如芒在背。综合观之，葛兰是一个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思想家，他极力寻找时代主题与伊斯兰话语的契合点，其对政治的关注服务于其宗教思想体系建构的需要，所以他的各种思想仍然是围绕着宗教的主导地位出发的，是为其宗教的发展提供前提和保证的。2001 年 11 月，葛兰针对其鲜明的政治目的指控而回应道，宗教对他而言比世俗事务重要的多，还认为将宗教纳入政府管理中是对宗教的不尊重。^④ 这一方面表明了其宗教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其对凯末尔主义的反思与超越。这也说明民众伊斯兰势力尽管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僭取了一定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突破宗教思辨的框架，其所建构的是现代伊斯兰思想体系，而非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责任编辑：李建欣)

¹ 转引自《宗教间的对话与和谐·编者按》，载《中国宗教》，2003 年第 10 期，第 24 页。

^④ Arthur Bonner, “An Islamic Reformation in Turkey”, p. 93.